

「邊防三老」

——清末民初南段滇緬邊疆上的國家代理人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提要

明、清王朝持續將「府、州、縣」體制向雲南西南部推進的過程，在1880年代與東南亞的殖民地化遭遇。邊疆族群關係和政治秩序的轉變需要配合國家體制的轉變，地方民眾更需要因應緬甸的殖民地化，調整和改變其長久維持的農業生產方式，參與市場經濟。在中緬、中老劃界過程中，原先族群關係糾葛、地理邊界模糊的邊疆領域，也在國家及其代理人的推動下納入到民國的體制中。這一過程與民族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相呼應，邊疆族群政治因而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另一類策源地與國家轉變的中心。這一轉變與彭錕、石玉清、柯樹勳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所扮演的國家代理人角色是分不開的，他們不但參與了民族國家的建構，亦成為促成邊界綫與新的邊疆社會關係形成的重要社會力量。

關鍵詞：民族主義、滇系軍閥、拉祜族、佤族、西雙版納

馬健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香港九龍清水灣道，電郵：hmjxm@ust.hk。

本研究得到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卓越學科領域計劃資助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及香港科技大學 DAG07/08. HSS05及 DAG10/11. GHSS01兩項基金的資助。作者衷心感謝石炳銘和刀德才兩位老先生長期以來的支持和教誨，惟文中任何不妥皆為筆者之責；作者並特別感謝何翠萍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修改建議。

一、前言

在有關雲南西南部邊疆的臨滄市、普洱市和西雙版納州的文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關清末至民國初年中緬邊疆「邊防三老」的記載，比如緬寧地方士紳彭錕，「在邊疆治軍嚴格，公正廉明，團結土司，對人民寬厚，深得各族人民敬仰，幾十年間，瀾、雙、緬、耿地方安定，與瀾滄石玉清、思普柯樹勳被稱為邊防三老」。^① 1937年，雙江縣政府為彭錕設立專祠祭祀，雲南省民政廳為此題贈匾額「沿邊三老，天表一人」，表彰他開闢雙江縣，「功在國家，德重邊民，彪炳千秋，漢夷景仰」。^② 與彭錕一道，瀾滄募乃土司石玉清，和車里（今西雙版納）殖邊總辦柯樹勳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中緬、中老的國境綫的勘界、劃界等邊界事務，他們與雲南南段中緬邊界地區的地方政府與少數民族事務關係密切。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和行動力量，深入地影響和塑造了今天中緬邊疆中國一側的社會生活面貌。雲南南部瀾滄江以西地區，從北往南自臨滄至雙江、耿馬、瀾滄、西盟、孟連諸縣到西雙版納，現今土地面積約3.7萬平方公里（略相當於臺灣島面積），人口二百多萬。按照雲南傳統的地理區分法，這一廣大領域可以分為山區河谷和山間盆地交錯的「山區」與「壩子」兩種地理類型。傳統上，西雙版納即1953年前稱為車里的南部邊境一帶，可分為勐海、景洪等壩子；沿瀾滄江西部自北往南，還分佈着勐勐、耿馬、勐角、勐董、勐允、勐梭、勐朗、勐濱、孟連等壩子，和其間由北向南走向的山脈，比如四排山、馬鞍山、孔明山、扎髮谷山等，形成了壩子與河流—山脈相間的地理和生態面貌，其間廣佈着拉祜、佤、傣等少數民族。因此，這是一個山區與壩子交錯而以山區為主、族群分佈多樣、森林廣佈河流縱橫的邊疆領域。由於不同族群之間已有長期交往，他們納入國家體制的過程及方式也各有複雜的政治經濟背景。

本文所謂「國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指的是像彭錕、石玉清及柯樹勳

① 見臨滄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臨滄縣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617。在本文行文中，地方族群名稱一般沿用歷史文獻中的「擺夷」指代1953年之後的「傣」、用「佤」指代「佤族」，沿用文獻中的「佤黑」作為拉祜族稱。雖然1953年後「佤黑」的官方名稱改為「拉祜」，在當地方言中「佤黑」發音 la⁵³ xɛ³¹ 與拉祜族自稱的發音 la⁵³ xo¹¹ 相似，但是「佤黑」中並不包括1985年後歸入的「苦聰」群體。本文在自稱意義上使用「拉祜」，但仍沿用文獻中的「佤黑」指稱1953年前的拉祜族，以避免將與「苦聰」相關的問題也歸類為「佤黑」。

② 「忠烈祠彭錕」，雲南雙江縣檔案館藏，民國檔案1-1-39，頁8。

這樣活躍在邊疆的政治精英們，他們從自己所處的立場、所代表的利益和文化身份出發，極大地發揮他們作為社會活動者的能動性，以地方群體代表的姿態，參與並推動了中國西南滇緬邊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的轉型時期，所進行的新型邊疆政治關係及族群身份的建構。在這裡，「代理人」的概念源自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對人類主體性建立中的能動性(human agency)討論。「代理」有時也被譯為「能動性」，指行動或表現的能力。在當代解構主義或後殖民理論脈絡中，這種代理人的能動性，主要表現為個體是否具備自由自主地展開行動的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們的作為又是被建構的。在後殖民理論討論中，代理人的能動性關乎後殖民主體能否成立，或是否具備抵制帝國權力的能力。^③ 具體而言，在有關社會精英作為國家代理人的能動性相關討論中，Ralph A. Litzinger 曾經指出，以瑤族為例，少數民族精英在國家政治中，基於民族識別、民族區域自治等政治框架，他們能夠一方面將個體能動性置於制度脈絡之下，另一方面也能夠靈活多樣地利用制度性條件，創造性地參與到國家的社會文化生產與創造中。^④

本文的討論所欲呈現的問題要稍有不同。在國家體制變化的過程中，同時在殖民地體制擴展的現代性條件之下，處於國家的政治地理邊疆之上的各類型社會活動者所能夠實踐的國家代理人的能動性，既是基於明清以來的中國王朝國家擴展時持續呈現的族群政治背景，也是基於中國的或歐洲殖民主義的國家體制向邊疆社會擴展時所遭遇的多樣性與衝突。在不同政治體制之間，變化中的空間與邊界因而既是地理生態的、政治體制的，還是經濟資源的、族群身份的，國家代理人的作為，因而並非簡單的合作或反抗。雖然本文無法在此展開來討論代理人及其能動性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限度，不過我們看到，當中國龐大的政治文化體制面臨着重新確定其地理上的邊疆的挑戰之時，地方上不同類型的國家代理人所展現的社會能動性，就成為特定

③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00), 8;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相關研究亦參見 Siu-Woo Cheung (張兆和),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uizhou,"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ed. Melissa J. Brow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6), 240-273。

④ Ralph A. Litzinger,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時期內邊疆建構的重要社會力量。因而，通過對近現代國家的邊疆建構的歷史回顧，正如蕭鳳霞所言，我們便能夠嘗試了解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變化過程中，人們處於特定語境下所表現出來的有目的、有意義的能動者和創造者的特性。「『空間』和『地方』其實是人們在不同的歷史關鍵時刻，以不同的方式想像、構建和磨合的結果。」^⑤換言之，現代國家的邊疆亦有其「地方性」過程，作為國家邊界的邊疆社會，憑藉怎樣的社會能動性，在其中活躍着一些什麼樣的能動者，方才從王朝國家轉變為民族國家的狀態的？這種轉變對地方人民的意義何在？「邊防三老」們所代表的地方精英，具備從地方立場來操控國家政治文化資源的能力與手段，使得來到邊地的國家的代表們如勘界官員和學者們，也不得不依賴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威和作為，方能順利達成自己所肩負的國家使命。他們亦獲得國家的支持，能夠在與不同勢力的討價還價和競爭中，靈活參與邊疆建構、協調各方衝突。他們在國家框架下建構邊疆、在邊疆態勢下擴展國家影響的能力，也正是他們作為國家的代理人與國家的代表之間的區別。

過去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的研究，比如馮客(Frank Dikötter)、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沈松橋等學者多以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和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入手，討論知識分子如何參與從「反清復明」到「五族共和」的民族主義論述和文化建構與政治動員，近代民族主義動員成為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⑥此外，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與民族自決理論和辯證唯物主義社會歷史階段論，又成為中國共產黨動員少數民族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論述。^⑦不過，以往的討論較少從地方歷史脈絡來檢討國家體制與族群關係在邊疆上的具體變化過程。僅針對精英階層，不足以詳盡了解中國的族群政治、族群身份在國家體制轉換過程中的地方歷史情境、表現及其對邊疆社會的長遠影響。反思從地方建構起來的政治生態如何

⑤ 蕭鳳霞，〈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第7卷，第2期（2009年10月），頁105-137。

⑥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M. E. Sharpe, 1996), 31-55；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

⑦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93-137.

創造了整體上的民族國家認同，有助於回歸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理論討論所缺失的地方歷史視角。郝瑞（Stevan Harrell）指出，中國近現代史上交替進行的儒家、共產主義和西方傳教士三類「文明化工程」，不斷推動着國家和主流意識形態對邊疆群體實施文化教化和身份改造。^⑧從這一角度，本文討論的雲南邊疆在清末至民國的社會變化，更能夠理解到從漢文化中心主義論述下的儒家教化轉向到中國民族主義下的「文明化工程」，並非突然間發生的歷史轉變。邊疆上的少數民族與漢人社會，都同時在殖民主義的壓力下經歷着國家體制與族群關係的轉變。因此，如果說「漢」或「華夏」身份的建立，是歷史長河中各種文化上被視為「蠻夷」的群體不斷轉變為「漢」的結果，^⑨那麼國家體制深入瀾滄江西部山區的過程顯示出，基於山區複雜的地理和生態條件，加之族群互動歷史久遠，國家體制在西南邊疆的深入與轉變，並非如「以漢化夷」般清晰或明瞭。

自郝瑞提出「國家分配的民族身份」的民族識別模式以來，學界對「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建立和實踐的討論，多離不開「自上而下」的視角。^⑩本文則更注重檢討在地方歷史脈絡下，當地族群政治的框架之確立，與漢人移民及其代表人物的國家及文化觀念之間密切的關係。早在民族國家確立前，雲南西南部山區業已存在的「漢」與傣黑（拉祜）、擺夷（傣）及佤山部落（佤）之間的依存關係，不僅與現代國家體制的確立同步進行着，東南亞的歐洲殖民地化更同時設定了邊疆社會變革的外在條件。也就是說，邊疆族群政治中的「漢族」政治經濟地位的確立與變化，與社會精英從「動員」和「救亡」的立場發展出來的民族國家理念，其實是同一歷史過程的不同方面。以此為基礎，才能隨之建立基於「救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論述，和「漢族幫助少數民族」、置漢族於社會歷史階段之發達的頂端的社會進化理論。^⑪從本文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地方社會意義上的雲南邊疆，在清末民初的國家代理人的推動之下，同一歷史時期內，正在以同樣的路徑參與

⑧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⑨ 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⑩ Stevan Harrell,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⑪ 毛澤東，〈新民族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9。

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建設。清末民初邊疆上漢人民族主義的興起，正好掩蓋了地方上歷史以來的族群對立和各類漢人利益集團對邊疆少數民族反抗者的鎮壓。在地方歷史脈絡中，界外的「英、法」和界內的「蠻夷」，正是同時促成現代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國界」產生的兩個基本元素。

二、清中後期南段滇緬邊疆上的族群政治

雲南西南部的瀾滄江流域一帶，在明代逐步形成了以順寧（今鳳慶）為政治中心的由內地漢人移民主導的社會。清雍正九年（1731），雲貴總督鄂爾泰先在哀牢山腹地「改土歸流」設置普洱府。之後，大量湧入的外省移民迅速改變了土著人口所佔的比例，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因土地、資源而起的衝突。清政府因之不斷往南向瀾滄江一綫推進流官體制。隨着內地移民自北而南漸次深入，又形成了以緬寧為中心的漢人移民聚居區、壩區擺夷土司領地（如耿馬、勐勐、孟連）、中部山區的佧山和保黑山及南部的車里（十二版納）幾個高度政治化的族群。這一變化，使得雲南與緬甸之間的區域，逐步從原先模糊的邊界領域變得日益清晰，實現了邊疆化的推進。^⑫ 這一帶不僅是清代普洱茶中「六大山茶」的重要產地，另有的重要銀礦募乃銀廠、茂隆銀廠。^⑬ 其中威遠江流域是雲南南部的鹽井要區，雍正「改土歸流」後，產鹽和鹽課稅佔雲南省20%以上。^⑭

例如，勐緬一帶原本是保黑人的聚居地之一，隨着移民的增加，乾隆十二年（1747）勐緬實施「改土歸流」後，改稱為緬寧撫夷廳。改流後漢人定居區逐漸向南擴展，形成了移民沿順寧、雲州、緬寧逐步深入的局面，並逐漸在緬寧建立穩固的土紳集團，取代了原先土司的勢力，鞏固了府、州、縣體制。到清末民初，緬寧壩子及周圍山區的外地移民已經達到約八萬人，佔總人口的80%。各地遷入的移民在緬寧建立了江西、四川、貴州、兩湖、石

⑫ 參見馬健雄，〈哀牢山腹地的族群政治——清中前期「改土歸流」與「保黑」的興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3分（2007年9月），頁553-602。

⑬ 倪蛻輯，李埏校點，《滇雲歷年傳》（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2），卷12，頁616：「（雍正九年）孟連夷酋刀派夷納募乃場銀，總督鄂爾泰據奏。奉旨收半，以昭柔遠至意。孟連……蠻名哈瓦，帘悍好劫。明正統中始內附。及本朝，不事勦遠，未與授職。其地募乃銀場，旺盛三十餘年，故漢人絡繹而往焉。」

⑭ 參見《雲南通志·食貨志》。

屏、太和、首郡、楚雄等八大會館，鞏固了漢人在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統治地位。^⑮ 在瀾滄江東岸新設的普洱府區域，族群關係要比西岸的順寧府複雜。地理上，普洱以南都沒有較大的壩子，遷入移民先後捲入到哀牢山腹地無休止的戰爭中，許多人繼續遷往瀾滄江以西山區，即倮黑山、佧山地區。一直以來，這裡社會動亂不斷，經濟資源多為鄰近的石屏、建水商人把持，普洱府並沒有形成宛如順寧、緬寧那樣穩固的土紳集團。更多的漢人移民繼續渡瀾滄江深入倮黑山後，成為倮黑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一部份，轉變為族群身份上的「蠻夷」。^⑯

因此，乾隆以來，在滇緬交界的怒江與瀾滄江之間山區形成了以倮黑山「五佛五經」為中心，西連佧山部落、北接緬寧漢人聚居區、南與車里擺夷（傣）土司連為一體的滇緬邊疆領域。雖然漢人士紳、擺夷土司、佧山部落和倮黑山首領之間互不統屬，但他們都受制於普洱府和順寧府的政治與軍事威懾，成為清王朝與緬甸王朝之間的過渡地帶。

乾隆三十年（1765），緬甸貢榜王朝（雍籍牙）建立後不斷進攻木邦、勐艮及車里各擺夷土司轄地。清政府於是發動了歷時四年的征緬戰爭，耗銀一千三百多萬兩，才與緬甸簽署和約，將緬甸重新納入朝貢體系，恢復雙邊貿易。^⑰ 戰爭之後，一位活躍在滇緬各土司地方的和尚楊德淵，逐漸在倮黑山中建立了新的政治體系。楊德淵祖籍西陽州，^⑱ 在大理雞足山長大並出家，之後遊歷上緬甸，在木邦居住。緬甸戰後，他來到瀾滄江西岸的蠻糯，在倮黑人中傳播他的教派。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德淵在南柵村修建中心佛寺，先後培養了三百多名弟子，其中著名的四大弟子，法號銅登、銅渭、銅碑和銅金。銅碑與江東的倮黑首領楊金往來密切，銅金在瀾滄江兩岸也交

⑮ 彭桂萼，《西南邊城緬寧》（雲南雙江：雲南省省立雙師邊城叢書編輯處，1937），頁7。

⑯ 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昆明：雲南省圖書館藏手稿），卷15，〈大姓〉，無頁碼。

⑰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324；王昶，《征緬紀略》（載方國瑜編，《雲南史料叢刊》，第9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

⑱ 西陽州，今重慶市西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與貴州、湖南、湖北接壤，明代及清代皆屬重慶府。詳見乾隆《西陽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結甚廣。楊德淵死後，銅金繼承了南柵佛寺的控制權。^{①9} 楊德淵和弟子們活躍在大理、木邦、普洱、順寧各地，建立的網絡遍及雲南及上緬甸。經過數十年經營，他們在傣黑山區建立許多佛寺和村寨佛房，成為以佛房為中心的政治體系的領導人。人們稱楊德淵為「改心和尚」，於是將緬寧與車里之間綿延數百公里的瀾滄江以西沿岸山區，即文獻所稱「傣黑山」區域，統稱為北部靠近緬寧的上改心和南部靠近車里的下改心，以蠻糯、南柵、南北渡等為中心，與清朝官府和擺夷土司抗衡。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慶四年（1799）間，瀾滄江東岸山區的另一部份傣黑土著因「壓鹽致變」，在威遠江流域燒毀鹽倉、搗毀鹽井，反抗清政府的鹽稅政策，結果被雲貴總督永保、伯麟等人派兵驅趕到瀾滄江西岸。隨後清軍進攻傣黑山，銅金和銅登投降。傣黑村民們不願意向擺夷土司交納「山水錢糧」，但願意聽從銅金和尚的領導，^{②0} 於是官吏們命令銅金還俗更名張輔國，任命他為南興土目，頒給土目鈐記。嘉慶十七年（1812）後，銅金領導下的傣黑逐漸強大，土司們聯名向雲貴總督伯麟控告，官軍再次攻破上改心，將張輔國押往緬寧斬首。

根據總督伯麟的調查，張輔國本人係漢人，到傣黑山當和尚、做了首領。他雖然被殺，但是以南柵為中心的「五佛五經」系統並沒有受到破壞。和尚們以南柵佛寺為中心，建立了五個或六個區域性的佛區，整個傣黑山地區稱為「五佛地」或「六佛地」。「佛區」略相當於今天的鄉，和尚們以某村的佛房為中心，管理區內各村寨，各村建立佛房，村民在佛房中選舉頭人管理村寨事務。各佛區中心佛房的主事人，一般由南柵佛房委派還俗的和尚擔任，這些人在下改心地區被稱為「庫」（khu³⁵）或「苴摩」（jo⁵⁴ mo⁵³），在上改心以漢語稱為「掌爺」。張輔國之子張秉權，逐漸在傣黑山北部靠近緬寧一帶建立了更為穩固的權力。在張秉權（拉祜名扎烏）和其子張登發（拉祜名扎鳩）統領的地區，擔任佛區首領的「苴摩」亦稱「太爺」，張秉權、張登發也被緬寧漢人稱為「傣黑太爺」。「太爺」下設六位「掌爺」，每個掌爺管理數个村寨，村寨首領即頭人（卡些，kha⁵⁴ xie³³），村民需服勞役、交稅，體制與過去擺夷土司管轄下的山區「圈」類似。戰爭時期，村寨中男子按三人一組各持

①9 釋廣園，《蠻糯傣黑眾等改心向善原本簿》（昆明：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情報中心，〈長期保存資料卷內目錄〉，345-3）。該簿原題記：「（廣園和尚）於嘉慶十年（1805）正月近寅三十日得病，二月初三日卯時去亦。初四日安厝於勐歪，晨時垂也。乙丑年（即同年）仲夏之月，緬寧府人王大章虔誠敬抄。」

②0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頁723。

弩、矛和叉並佩短刀，作戰時每人備100支箭，由村寨的兵頭（瑪巴路，ma³¹pa³¹lu³⁵）負責組織，兵器有火槍、射程二百多米的火炮等。^②在「五佛五經」體系中，各村寨由佛區管轄、向佛區的佛房交稅，佛區又屬南柵或蠻糯管理、向南柵中心佛房交稅。各佛區首領在南柵舉行定期集會，各地村民也需要到南柵去朝拜。這個「村落—佛區—中心佛房」三級政治系統從乾隆末年到光緒末年，持續了一百多年，使得整個保黑山上、下改心地區維持着獨立的、政治與宗教結合又不隸屬於擺夷土司的體制。所以，歷任雲貴總督一直以「驅趕」、「防堵」或「招撫」的政策對付保黑山。如果不是緬甸的殖民地化，清軍不會貿然改變策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用固藩籬」，為劃界做準備。

保黑山南與車里相連。車里即傣語所稱之西雙版納(Sipsongpanna)或「十二版納」。「版納」意為「千田」或「田賦區」，各「版納」的劃分可以調整。「十二版納」的劃分，或者以一「勐」為一「版納」，或者以數「勐」為一「版納」。傣語稱分佈在壩子中的行政單位稱為「勐」，各勐皆屬設於景洪的召片領（即世襲車里宣慰使）管轄，如勐海、勐遮、勐滿、勐臘、景洪等，由「召勐」協同「司廊（漢譯為議事庭）」管轄。各「召勐」官職世襲，但須議事庭認可，並分別擁有土把總、土千總、土便委等土司頭銜，負責向屬下各村寨收取門戶稅。土地除召片領擁有的私田之外，皆為各村寨公有，由村寨議事會分配給村民使用。因此，所謂「版納」，是車里宣慰司向中緬雙方上繳田賦的賦稅區域單位。元代曾在車里設軍民總管府，明初改設車里軍民宣慰司。民國初年，車里人口約十七萬，^③現今面積1.97萬平方公里。^④原來的「十二版納」，因雍正七年（1729）鄂爾泰設普洱府時，將瀾滄江東六個版納劃歸普洱府管轄，在攸樂（今基諾山）設同知，在思茅設通判。^⑤車里宣慰需要同時向中緬雙方納稅，並為清政府出兵打仗，即史書所稱「土練」或「江練」。鄂爾泰新設普洱府後，定十二版納交納賦

① 雙江縣民組事務委員編，《雙江縣民族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5），頁41。

② 李拂一，《車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23；李拂一，《十二版納志》（臺北：正中書局，1955），頁183。

③ 李拂一，《車里》，頁140-141。

④ 不過，柯樹勳解釋為，車里原有十三版納，後因孟烏、烏得一版納割讓法屬越南（今老撾），為十二版納。見柯樹勳，《普思沿邊志略》，載《西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但是李拂一解釋說，昔時車里分配上納中、緬田賦區劃之名稱時，緬甸要專門將宣慰使的駐在地作為一個單獨的版納，索取十三份版納的田賦。因此用中文翻譯傣、緬文書時，常常誤以為原有十三版納。李拂一，《車里》，頁145。

稅糧米1,084石，以銀折算上繳。²⁵ 各「勐」為擺夷（傣）聚居，周圍群山中分佈着阿卡（愛伾）、佤黑、布朗等山區族群，屬山區「十二火圈」。²⁶

總體來說，佤黑山的政治體制還是從各擺夷土司轄下的「圈」中擠佔出來的。車里以北、瀾滄江以西的其他各星散的擺夷土司，在明、清政府轄下官秩品級相當，轄地一般以壩區的「勐」和山區為主的「圈」為賦稅單位。車里之外，孟連土司設「三猛五圈」，耿馬設「九勐十三圈」等。在孟連、耿馬和勐勐土司的體系中，無論「圈」或「勐」，都需要向土司交納「山水銀」。土司屬下設有郎猛、掌猛、郎家、管事、白找、火頭等頭目，負責收取錢糧、訓練兵丁，維持治安。土司有審訊、斬殺權；土地則分為土司所有的官田，由土司派役耕種；村寨所有的火頭田，收入歸火頭（頭人）所有。此外，村寨內部，有村民按戶領取的「份田」和村寨頭人與長老議決、可以靈活分配調整的「寨公田」。在土司制度下，村寨集體對土地有很大的控制權。在勐勐，土司按照固定的稅率，每年向各圈收取山水銀三百三十兩、錢糧近二百四十兩。²⁷ 但是，佤山各部落因以獵頭阻擋外人進入，土司無法收稅，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單元。佤黑遷入瀾滄江以西山區後與佤山各部並列，因為「五佛五經」的設立也拒不向擺夷土司交納賦稅，這也就是文獻中銅金和尚屢與土司「爭地」的原因。

簡言之，北起緬寧、南達車里的瀾滄江以西區域，不同政治體制相互連接依賴，成為地理上的整體，通稱為南段滇緬邊疆。其中，擺夷土司往往同時為清朝官府、緬王兩邊承擔賦稅，佤黑山「五佛五經」體制則被清政府當作區隔緬甸的藩籬，佤山各部落則透過「獵頭」機制，對往來的客商、移民與礦工進行選擇，通過判斷外來者與各部落之「友好程度」來確定誰可以進入或借道通過佤山，以此設定佤山體制的政治邊界。在佤黑山被清軍攻破之後，佤山各部落仍然保持其政治上的獨立性。這樣，漢人官紳與擺夷、佤黑和佤山之間，形成了相互拉鋸的幾類政治體制，從而為民國以後的漢族、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的民族識別設定社會歷史條件。自雍正、乾隆時期的「改

²⁵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臺北：作者自印，1984），頁83。

²⁶ 朱德普，〈古代西雙版納傣族統治集團對山區少數民族的統治策略〉，載氏著，《泐史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388-401。

²⁷ 編寫組，〈耿馬古代九勐十三圈的門戶錢和婚喪禮節習俗調查〉，載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雲南省編輯組編，《臨滄地區傣族社會歷史調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16。另見朱德普，〈古代西雙版納傣族統治集團對山區少數民族的統治策略〉。

土歸流」至清末鎮邊廳在保黑山設立之前，上述四類政治體制和族群身份，在相互之間的對立又依賴的互動中，維持着南段滇緬邊疆的穩定。清政府隨漢人移民而推進流官體制的過程，在礦業萎縮引發的族群衝突及戰爭中停頓下來，同時緬甸、暹羅之間和擺夷土司之間的爭戰，也限制了流官體制進一步向南拓的可能性，保黑山政治體制因以迅速發展壯大，從緬寧到車里的邊疆連為一個整體領域。²⁸

三、緬甸、越南的殖民地化與邊界談判

英國佔據緬甸、法國佔據越南改變了滇緬邊疆的政治環境，與英法雙方協議劃定國境綫以阻擋英法殖民者的步步進逼，成為清政府最急迫的邊疆政策。經過長期的「紅白旗」戰爭，清政府不得不依賴地方團練勢力來維持邊疆政局，因而在英、法威脅之下邊疆局勢的變化，成為「邊防三老」興起的直接原因。1885年英軍佔領曼德勒，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併入英屬印度。為了應對緬甸的變化，雲貴總督岑毓英派兵從普洱西渡瀾滄江，又從北部調集緬寧團練向南進攻，經過數月苦戰攻佔了南柵和蠻糯，於1888年在保黑山設立了鎮邊撫夷直隸廳，隸屬普洱府，但因保黑抵抗不斷，鎮邊廳一直無法有效運作。張輔國被殺之後，保黑山的領導權由其子張秉權、孫張登發等張家後代繼承，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登發之孫張朝文繼續領導保黑，抵抗從緬寧南下的團練武裝。自光緒以來的歷次戰事中，緬寧紳首彭錕和接受清軍招安的石廷子父子以及車里的柯樹勳，成為替清軍作戰、鎮壓保黑的主力。民國七年（1918），下改心地區的保黑再次起事驅逐漢人，此時，柯樹勳、

²⁸ 參見岑毓英奏摺：「查保黑以種人而名其地，分為上下改心，在順寧府之西南隅，普洱府之正西，以瀾滄江為限；正北、東北均界緬寧，東界威遠，東南界思茅，南界孟連土司，西南界緬甸，西界佯瓦野山，西北界勐勐土司，勐勐土司之外屬耿馬土司；東西四百九十里，南北一千五十里，皆山深箐密，為極邊險阻烟瘴之區。中有辣蒜江，俗名小黑江。上改心在江之北岸，舊為勐勐地，東弄、細些、白竹林、壩卡、大蠻糯、滾崗、圈控各地方屬焉。下改心在江之南岸，舊為孟連地，小壩子、蠻引（上允）、大山、圈糯、蠻蚌、大丫口、過龍新寨、邦糯、錫丙各地方屬焉。俗重佛教，故又有四大佛房之名。其蠻蚌、大丫口之間有康朗河，源出康朗（卡朗），東流入瀾滄江，俗名為黑河。至入保黑之路，由威遠西渡大蚌江，與緬寧東路相會，渡小黑江下游之蠻招渡，以達孟連，謂之東大路；由東大路壩卡分道，渡小黑江上游之賽罕渡，以達勐引，通佯瓦，謂之西大路。其地毗連耿馬、孟連各土司，與緬甸逼處，實為順寧、普洱兩府屏障。」岑毓英，〈酌議保黑改設鎮邊廳事宜折〉（光緒十四年〔1888〕四月十六日），載《岑毓英奏稿》（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923-924。

彭錕、石廷子父子共同率兵鎮壓，贏得官方褒獎的「邊防三老」之名。

當邊疆的內、外部環境在短時間內面臨着劇烈變化的社會條件下，回顧「邊防三老」興起的過程，就成為理解邊疆上「國家代理人」的歷史情境的立足點。英國佔領緬甸後不久，光緒二十年（1894）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方簽定邊界條約，決定以位於佤山中心、孟定以南界於瀾滄江和怒江的支流分水嶺為國境分界綫，但如何確定界綫還需要雙方勘定。^⑳英國隨即派兵進入佤山，被佤山南康烏（即上莽冷，今緬甸佤邦南抗武）聯合十二部落（或稱「十二召華」）狙擊敗退。^㉑既然英方無法進入佤山，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英方殖民官司德格（James George Scott）與中方負責北段界務的臨元鎮總兵劉萬勝、負責南端界務的迤南道陳燦會勘滇緬邊界。從孟定南定河以南至孟連南馬河入南卡江一段，因西盟勐梭土司罕炳昭聯合佤黑、佤山部落在中國一側持續抵抗官軍，勘界隊一直不能進入，緬甸一側的佤山各部落也抵制英國人。佤山區域在鎮邊廳設置之後，仍然因為無法進入、不能清晰勘測劃分而成為未定界，直至1961年最後劃定止。經過長期劃界談判，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中英雙方僅能依據不同的要求，形成紅（英方自繪綫）、綠（英方擬讓綫）、藍（中方綫）、黃（薛福成與英國議定綫）四綫，繪成「滇緬南段未定界」地圖。^㉒經過雙方數次勘察都未能確定的界綫，到了1941年勘界所確定的中立委員綫（紫綫），最後形成了1941年劃定的未定綫，^㉓繪成所謂「五色綫圖」。在數次勘界過程中，緬寧土紳彭錕、瀾滄募乃土司石玉清都作為地方代表參與其中，柯樹勳也作為地方代表，與車里土司一起參與了中越（老撾）、中緬南端已定界的邊界事務。特別是從1894至1941年的至少三次的勘界過程中，如果沒有彭錕和石玉清的參與和組織，中方官員很難反駁英方的定界要求。

當英、法侵佔緬甸、越南之時，雲貴總督岑毓英也正籌劃在佤黑山設置鎮邊廳，準備與英方勘界劃界。岑毓英為廣西人，起初帶領家鄉團練到雲南參與鎮壓杜文秀政權，因功升任雲南巡撫和雲貴總督，他和兒子岑春煊等曾左右西南政局數十年。岑毓英手下兵練在雲南都被稱為「粵勇」，編為「粵

⑳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頁573。

㉑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頁516。

㉒ 嚴懋德，〈中緬界務糾紛之回顧與前瞻〉，載包遵彭、吳相湘、李定一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七冊（臺北：正中書局，1969），頁65-78。

㉓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頁590-592。

字」、「廣字」和「西字」營。³³光緒十二年（1886）中法劃界結束，第二年岑毓英即調兵進攻保黑山，雲南地方人士認為，「張秉權之役，適當雲貴總督岑毓英進兵安南失利，虧空至巨，得張秉權父子起事之信，遂長大其詞，發大兵進剿。」³⁴緬甸與越南、老撾分別在短時間內淪為英、法殖民地，保黑山已不可能再充當區隔緬甸的邊界，但新設的鎮邊廳也無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取代「五佛五經」體制，岑毓英及其幕僚便採取招撫保黑中的投效者為新土司的方法，逐步瓦解保黑人的抵抗。另外，彭錕又將上改心地區分割出來由緬寧土紳管轄，保黑山的政治勢力便在軍事打擊、招撫和分而治之的策略下崩潰了。

在彭錕的主導下，緬寧土紳集團廢除了勐勐擺夷土司、疏通滇緬貿易通道後設立了雙江縣，同時柯樹勳也在該地區南部分化和打擊了保黑山遺留勢力與車里各勐土司的聯盟，以「廣人」的軍事壓力實行「土流兼治」。但是在保黑山中心及瓦山，鎮邊廳因無法運作而形同虛設，邊界談判時斷時續，石家便承擔起了溝通瓦山和保黑的中間人，策略性地以「非漢非夷」身份，沿襲「五佛五經」體制下的村寨權威體系，與各新設土司結為聯姻集團。不過，無論是在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雲南省政府一方而言，除了依賴當地這些聯姻家族之外，並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來經營鎮邊廳。「五佛五經」崩潰後，從緬寧到車里的整個區域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則是，隨着緬甸和東南亞的殖民地化而出現的商品經濟在山區和壩區的深入擴展引發的連鎖反應，尤其是鴉片、茶葉、礦產品和洋貨貿易的興盛，更進一步地推動着邊疆社會的變化。

雲南曾是清朝最重要的鑄幣及流通用銅和銀的產地，雲南地方政府需要將大量生產冶煉的銀、銅從各礦山輸送到各省和北京，雲南邊疆的銀銅礦產，成為支持清朝政府財政運作的基礎。道光以後，雲南銀銅礦業衰退，並引發了咸豐、同治年間民間稱為「紅白旗」的杜文秀起義（1856-1872）。³⁵自同治七年（1868）開始，「京師自滇銅停運，鼓鑄不能」。³⁶經過18年的「紅白旗」戰事，雲南地方經濟越來越依賴鴉片貿易和大錫出口，到了民國

³³ 岑毓英，〈遣散粵勇片〉，載《岑毓英奏稿》，頁270。

³⁴ 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卷3，無頁碼。

³⁵ 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 1856-187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白壽彝，《回民起義》（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³⁶ 岑毓英，《岑毓英奏稿》，頁57。

初年唐繼堯時期，鴉片烟稅幾乎佔到財政收入的40%，鴉片收益成為支持民國滇系軍閥的重要財源。^⑳ 緬甸殖民地化之後，滇緬交通綫路暢通無阻，雙江和勐海逐漸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逐漸興隆的對緬甸和暹羅貿易，成為地方上的另一大宗收益。瀾滄江沿岸為茶山集中之地，滇南茶葉開始大量由勐海往英緬一方輸出，甚至通過印度輸入西藏，總量每年平均在五千擔（每擔散茶重一百斤）以上。瀾滄江以西的江外車里各地，茶葉總產量在民初每年為兩萬擔左右，江以東各茶山產量每年約兩、三千擔，茶價則每斤七、八元至二十餘銀元不等，江內茶市場價是江外茶的數倍。^㉑ 勐海一帶隨着漢商的增多，逐漸成為車里的茶業中心。民國雙江設縣後，也逐漸開設了11處市場，成為「六大茶山」之外的另一大茶葉產地，每年產茶葉約一萬擔，地方收入約二十萬銀元。作為保黑山北部的通道，商人也從緬甸臘戍入口洋貨到雙江，以洋紗、洋碱、布匹為大宗，地方社會經濟在短短二十年間，發生了鉅大變化。^㉒

在族群政治層面，緬甸、越南的殖民地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文化上的「主體」與「他者」的關係。在雍正、乾隆年間的地方大員而言，對滇緬邊疆的經營除了考慮開拓稅基、改變土地制度和管制新增移民人口之外，對保黑山、江外土司的態度，或受制於與緬甸交戰的風險，或看重緬王朝貢的意義，將兩江之間的保黑山、佧山視為「藩籬」，才為「五佛五經」的發展提供了時間和空間的可能。緬甸、越南的殖民地化也促成了邊疆社會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商品經濟和貿易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山區社會更加依賴那些能夠溝通各地的漢商。佧山各部落因為成功地維持着地域邊界，迅速成為雲南乃至東南亞最重要的罌粟種植區，持續地以鴉片為民國初年滇系軍閥的連年征戰提供重要財源。但是，一旦單一經濟作物成為日常生活的依賴，作為維持佧山在區域性的族群生態中的地位的文化機制，「獵頭」和「剽牛」就越加顯得重要。在族群及政治邊界得到穩定維持的情況下，佧山各部落轉向為以出產的鴉片貿易糧食，並輸入大量牛隻作為維持社群關係的重要文化手段。這樣，遠距離貿易的商人們，便透過石家的網絡所控制的貿易渠道，將邊疆與內地聯繫起來，也為佧山維持其族群與社會邊界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支持。逐漸地，通過佧山和保黑山，雲南與緬甸的貿易在殖民主義到

^⑳ 謝本書等，《雲南近代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185、434-435。

^㉑ 李拂一，《車里》，頁41。

^㉒ 彭桂萼，《雙江一瞥》（雲南雙江：雲南省省立雙師邊城叢書編輯處，1936）。

來之後穩定增長，茶葉、礦產品輸出到緬甸換回洋紗、武器和其他工業品。緬寧等雲南內地社會也因此逐漸透過遠距離馬幫貿易擴展其商業貿易網絡、推進地方整合，民間依賴於洋紗的紡織業也快速發展起來。這些經濟上的變化，都為民國初年雲南及西南地方社會的地方整合，奠定了全新的政治經濟基礎。

四、彭錕與緬寧土紳集團

以保黑山為中心，南段滇緬邊疆成為國家體制與族群政治激烈交匯的領域。以「邊防三老」為代表的一批政治精英，通過對國家政治文化正統話語的操控、抵抗或調適，成為塑造邊疆社會的重要力量。數十年內，中、緬兩國的邊界綫逐漸被固定下來，在新型國家體制下，邊疆的意義逐漸由地理上的領域轉變為分割群體的界綫。

彭錕（1855-1928）是緬寧漢人士紳的首領。緬寧改流之後，彭錕的一位族祖從江西吉安府來到緬寧做教書先生，隨後另一位族祖也來到緬寧，參加了改流之後的第一屆科舉考試，中舉人。嘉慶四年（1799），這位舉人在與保黑的戰事中陣亡。^④待彭氏在緬寧建立根基之後，更多的宗族親屬從江西遷來，彭錕的祖父也於嘉慶年間來到緬寧做生意。彭錕少年時逢「紅白旗」動亂，科舉停辦。^⑤他十歲喪父，十三歲學裁縫、十五歲學染布，同時兼讀私塾。十九歲到順雲協任職文書，因辦事幹練，很快得到上司、順雲協副將丁槐的提攜。丁槐派他領兵進攻勐角、勐董佉山，因功獲授九品職銜。丁槐後來辦理臺灣軍務，又出任廣西提督。^⑥得到了丁槐的賞識，積累資本人脈之後，彭錕在瀾滄江馬臺渡口開設鹽號，販售景谷鹽井運來的私鹽致富，隨後在緬寧倡建江西會館，並以會館為基地組織「洞經會」操演洞經，舉辦團練。^⑦光緒十三年（1887）岑毓英集兵進攻保黑山時，三十二歲的彭錕已經是緬寧團練的首領了。進入衙門獲得官僚的賞識，販賣私鹽因以致富，成為

④ 〈緬寧彭氏族譜序〉，載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卷15，〈大姓〉，無頁碼。

⑤ 由雲龍，〈奉資政大夫雲南普防營管帶彭公耀南墓表〉，載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卷15，〈大姓〉，無頁碼。

⑥ 丁槐出生鶴慶商家，後任廣西提督和雲南提督，參見雲南省鶴慶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鶴慶縣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765-767。

⑦ 刀德才，《雙江彭氏事略》（雲南雙江：作者未刊手稿，1998）；雙江縣志辦公室編，《雙江縣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5），頁858。

地方紳士操辦團練，是彭錕將緬寧官紳勢力擴展勐勐和保黑山，成就其「天表一人」之功勳的出發點。

在「紅白旗」時期，保黑山首領張秉權與佔領緬寧的回民白旗軍關係友善，杜文秀政權也向張登發頒授官印。^④光緒七年（1881），張秉權的勢力已經延伸到緬寧南部，威脅着緬寧壩子。光緒十三年（1887），岑毓英派兵進佔保黑山，張登發、張石保等被俘押解緬寧，「當訊判二保黑（張登發）時，跳蕩不服，以言語不通，終被梟首」。當地父老相傳，張秉權、張登發父子在與清軍作戰時，「登峰設險，如履平地。其所用之弩重三百斛，官軍五、六人不能上，二保黑以一手一足運用自如。弩箭均用毒藥浸透，百步之內，於之無幸免。」^⑤即便張登發祖父張輔國本是漢人，在保黑山做了首領後，他的後代已經與漢人語言不同，審之跳蕩不服，成為一個文化和身份上的保黑（拉祜）了，他們在拉祜神話中屢被提及，或為「開山佛祖帕」，或者是重生的厄沙佛祖，領導拉祜打回到勐緬密緬（緬寧）去。^⑥這裡可以看到，張輔國、彭錕代表了漢人移民不同的在地化策略。張輔國及其後代成為動員保黑山宗教運動的領袖，也改變文化身份成為拉祜，彭錕則代表了與之針鋒相對的勢力，在緬寧參與建立了邊疆上的「漢人」的政治文化體制。

岑毓英認為，保黑山地域遼闊，周圍耿馬、孟連和勐勐等土司無法與保黑抗衡，官軍一撤，保黑必然又要重新組織起來。當緬甸前景未明之時，更

④ 《關於瀾滄佛教的摘抄》（昆明：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情報中心，〈長期保存資料卷內目錄〉，345-3）。

⑤ 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卷3，無頁碼。

⑥ 馬健雄，田野筆記，1995年12月25日。關於張輔國的漢人移民背景，參見張輔國嘉慶十八年（1813）四月供詞，「（年四十四歲）我自幼出家，在南乍（柵）地方為僧，名叫銅金。嘉慶四、五年間，聽從已正法的李文明滋事，後見他事敗，我就具結投誠。蒙前任總督仍令在南乍（柵）居住、約束保黑，我便還俗，更名張輔國。八年間，蒙前任巡撫准我允當孟連所屬土目，約束保眾。」見雲貴總督伯麟奏摺〈拿獲張輔國審明等由〉。另據嘉慶五年（1800）雲貴總督書麟奏摺，「此等漢僧人數眾多，不獨勐勐為然。其附近之孟連、車里、六困、勐班等處遍地皆是，毋論保黑、擺夷、蒲蠻等類，無不奉若神明、牢不可破。」轉引自武內房司，〈十九世紀前半、雲南南部地域における漢族移住の展開と山地民社會の變容〉，載塚田誠之編，《中國國境地域の移動と交流——近現代中國の南と北》（東京：有志舎，2010），頁117-143。有關滇緬邊疆山區17世紀以來礦業的發展，以雞足山為基地發展起來的秘密宗教教派大乘教在乾隆征緬戰爭前後的活動，及其在保黑山、佉山社會的影響，參見馬健雄，「Shaping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 by Secret Societ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Mousson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France), 17 (2011.1): 65-84。

需要設立鎮邊廳，勘察土地人口和邊界，確定可徵糧賦。^{④⑦} 這樣，作為邊防前沿的緬寧順雲協、景谷威遠營，就有了屏障。^{④⑧} 在此次戰事中，彭錕帶領緬寧團練一路攻到南柵，將保黑山「五佛五經」的政治宗教核心摧毀。^{④⑨}

鎮邊廳雖然建立起來，清政府仍然無法有效治理保黑和佉山。由於不滿各地越來越多盤剝生利、佔據土地的漢商與新遷入移民，光緒二十九年（1903）保黑山和佉山各部在鮑岩勳、刀文林等各族頭領，在張登發的另一個兒子張朝文的率領下再次起事。他們自稱「仙人」，以跳葫蘆笙聚眾動員，各地佉族、保黑村民紛紛聚集響應，攻佔勳勳城，驅逐漢人移民和商人，準備與緬寧方面決戰。^{⑤⑩} 彭錕再次率領緬寧團練出征，緬寧地方官蕭澤春記述說，「澤春捧檄權緬，初抵臘丁，即聞上改心猓匪肇亂，戕官焚掠，蹂躪緬邊。次日莅衙接篆，警報迭驚。維時耀南（彭錕字）先生亟來晉謁，一見即偉其風度，知為非常人。與談戎事，豁略素嫻，慨然以出征自任。越二日，即親率團營前進，忠勇颯發，猛銳雲興，由臨安（寧安）直搗蠻糯，勢如破竹，犬羊巢穴一搗而空。斬逆首張朝文、偽仙人羅扎布等，其餘俘虜，奪獲槍弩軍械不可勝計。當之者無不辟易，觀者疑為神兵。」^{⑤⑪} 從地方官對紳首彭錕的贊譽之辭、之態，我們能夠真切體會到緬寧官紳的特殊關係。此次鎮壓保黑戰事，彭錕率領的團練已經是作戰主力，而雙方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變成了保黑和佉山部落與壩區緬寧漢人、勳勳土司之間的爭奪與殺戮。戰事最後以保黑首領李三民等人逃往緬甸告終，彭錕獲授管帶、五品縣丞職銜，駐守南柵。此後，以商而為紳，又以紳而為官，彭錕在戰爭中建立起地方政治權威，成為上改心的實際統治者。他意識到，土地權、司法權的變更是不同政治體制之矛盾的癥結。隨即，彭錕在勳勳各圈陸續實行改革，廢除土司制。按照新的規定，各村火頭田作為學田，用以開辦學校；廢除土司的司法權，所有案件須交由緬寧廳審理；簡化行政，每圈設圈目一人，後又改為區，以里長管區，將百找、火頭改為甲長，按上、下等戶每年收取不同數額的門戶錢。在靠近佉山的地區，將村民編定屯冊，按壯丁三抽

④⑦ 岑毓英，《岑毓英奏稿》，頁903。

④⑧ 岑毓英，《岑毓英奏稿》，頁925、933。

④⑨ 雙江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雙江縣民族志》，頁296。

⑤⑩ 雙江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雙江縣民族志》，頁47；刀德才，《雙江彭氏事略》，頁2。

⑤⑪ 蕭澤春，〈緬寧彭耀南先生平定猓作記功碑記〉，載邱廷和纂，《緬寧縣志稿》，卷19，〈藝文〉，無頁碼。

一、五抽二的方法訓練屯練，由負責軍事的屯長操練。所有山水錢糧照舊收取，除餘留部份為屯練經費外，其餘上繳緬寧廳。⁵² 在彭錕的長期經營下，1926年，鎮邊廳所屬上改心與緬寧縣所屬勐勐合併，成立了雙江縣，到彭錕去世時，縣、區、鄉、鎮、里、鄰的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每里約管轄一百戶。⁵³ 雙江民國縣制的建立，廢除了土司的權力即確立了土地買賣和私有權，將新移入漢人對土地的佔有權合法化，彭錕不僅得到了漢人移民的支持，也增加了緬寧廳的財政收入，為緬寧官、紳謀取了新的利益，漢人移民的土地權、官府的司法權和漢商的貿易機會，都得到了政治上的保障。

作為地方代表，由於彭錕曾經數次深入佤山和南柵一帶，應中英邊界談判和勘界的需要，彭錕繪製了詳盡的滄源、耿馬、鎮康、孟連、西盟各處地圖，以供清政府與英方談判的需要，並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跡。隨即，雲南官方指派彭錕參與了第一次中英勘界（1899-1900）。此後，正值彭錕領軍鎮壓保黑張朝文起事的同一年，又將次子彭肇紀送到日本留學，同批赴日的還有緬寧同鄉葉荃、趙又新等人。他們在日本期間與雲南同鄉唐繼堯、顧品珍同學，同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緬寧同鄉三人又與李根源、程潛、閻錫山等一起加入同盟會的中堅「丈夫團」。彭肇紀參與雲南同鄉在東京創辦《雲南雜誌》，在留日學生中宣傳民族主義，《雲南雜誌》成為民國創建時期宣傳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渠道。此間，彭肇紀在給父親彭錕的家信中說，雲南同鄉組織出版《雲南雜誌》，目的是輸入文明觀念，抵禦英法。特別注意「西南與英人交涉之原委。大約每次劃界，由某處至某處，某年、某月何人為界員，共讓與英若干里，並交界處，我以何處為重鎮，其地為何種人的地方，有無烟瘴，能否駐兵。土司作保各種之歷史，大約何種人，性質若何，何種人之土地，劃歸英者幾何」。雲南留學生對邊疆問題的關注，涉及到抵禦英法的民族主義動員。彭肇紀請求父親提供邊事詳情和地圖，特別是張登發起事的經過、與英國的交涉等。他向父親解釋《雲南雜誌》備受留日學生重視的原因是，「前日外省人甚小視雲南，謂蠻夷人。雜誌出現，其中好著作甚多，且抵制英法，調查邊事不遺餘力，於是名聲大噪。前之輕視滇人者，今反敬服滇人。敬服之不暇，從而請教之、恭獎之。如四川留東千七八人，尚不以英法圖謀四川為意。今屢見雜誌之拒英法以保雲南不亡，伊始猛

⁵² 〈緬寧廳革除土司弊政禁約碑〉，載雙江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雙江縣民族志》，頁359-361。

⁵³ 「伯常先生書信」，雲南雙江縣檔案館藏，民國檔案1-1-5。

醒，起而議出《四川雜誌》，河南同鄉會亦出《河南雜誌》」。④ 彭兆紀與緬寧同鄉及好友葉荃、趙又新等人返回雲南後投身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1915年，葉荃招募數千名緬寧、雲州、順寧子弟，奉調編為護國第五軍。⑤ 1917年，唐繼堯委任葉荃為駐粵滇軍總司令，又改任靖國軍第八軍軍長，彭肇紀出任參謀長負責軍需物資，趙又新也任第二軍軍長，三人同為滇軍中的重要將領。⑥ 1921年，彭肇紀在昆明經營「中和茶莊」，並以之為據點與葉荃等人密謀倒唐，不料消息走漏，彭肇紀被唐繼堯俘獲槍殺。作為父親的彭錕，則在主政雙江縣之後，於1925年採取強烈姿態，驅逐從緬甸景棟進駐雙江的美國浸信會傳教士永偉里(William Young)父子，他將傳教士逐出雙江的取態，更常常作為地方力量反抗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一大功蹟。⑦

彭錕在文化上強調自己的「江右移民」身份，建江西會館，又建祠堂修族譜，在雙江辦學校，以在佹山和保黑山建立漢人的政治文化正統為己任，面臨的始終是邊疆政治中的族群衝突和「漢」、「夷」矛盾。不過，這些事件到了兒子彭肇紀那裡，就成為另外一個意義的問題，即「調查邊事、抵制英法」以擺脫外省人面前雲南人的「蠻夷」形象，另以「滇人」論述加入同盟會的民族主義動員。此時，邊事一方面對內是種人的問題繼續，另一方面對外是「拒英法列強以保雲南不亡」的救亡號召，《雲南雜誌》的主辦者們於是將家鄉的邊疆問題帶到日本，成為參與民族主義動員的重要理據。然而不同的策略是，彭肇紀強調的「他者」不再是「蠻夷」而是「英法列強」，他和他的同盟會同鄉們轉而強調自己的「滇人」身份、是雲南這塊土地的主人；他們自己也成為緬寧集團的代表者，參與到「護國運動」和雲南地方軍閥的征戰中，或殞命於同志與對手的刀下。彭肇紀等留日學生率先強調「滇人」身份、「拒英法以保雲南不忘」，以「滇人」認同來動員救國救亡的民族主義，多少與後來的聯省自治運動一脈相承。從彭錕到彭肇紀，清朝緬寧士紳的政治勢力進而延伸到了民國雲南軍閥集團的核心。在父親彭錕那一代，政治上的對手主要是保黑山的張登發們；到兒子彭肇紀這一代，緬寧子弟兵已是滇軍翹楚，他們不但要以抵抗英法為號召建立民國，還要與唐繼堯

④ 刀德才，《雙江彭氏事略》（附錄：〈彭肇紀從日本寄回給其父的信〉，此信複印件由彭肇紀外孫唐奇才提供）。

⑤ 民國《雲縣志》（雲南雲縣：雲縣志編纂委員會，1983），頁36。

⑥ 臨滄地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臨滄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雲南臨滄：臨滄市政協，1992），頁66。

⑦ 雙江縣志辦公室編，《雙江縣志》，頁859。

們去競爭「滇人」的領導權。清末民初，當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動員興起之際，滇緬邊疆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另一類中國的救亡民族主義的策源地。當官紳政治經濟權益在保黑山擴展時，官紳政治的另一端也延伸到「滇人治滇」的地方軍閥體系內部，邊疆上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也成為促使邊疆政治與當時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在知識分子、地方軍閥勢力等不同力量聯接、混合的一個重要根源。這樣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從李根源與章太炎的密切往來及他們與各派地方軍政勢力的聯繫中看到。⁵⁸

五、瀾滄石家與地方聯姻集團

在進攻保黑山之前，岑毓英先進行了調查。在當時看來，「保黑由外處遷徙而來，生齒日增，勢力滋長，卡瓦東部寢為佔據，卡瓦乃漸次西移，是以東部多保黑。而保黑之中復有黃保黑一種，其頭目十之七八皆有李、趙、石、張等姓者，自言本江西人，其祖輩到此已安家數世矣。此種黃保黑，幾佔廳屬之半。……其後，內地人或亡命藏匿，或行商至止，人地既熟，擇鄰而處，多娶土人女為妻，率皆富甲一鄉，浸假而握地方大權，浸假而充土人豪率，此本境望族類多漢人之故也」。⁵⁹ 根據石家的家譜和傳說，石家祖先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間跟從沐英從江西進入雲南的軍戶，在哀牢山區景東衛落籍。乾隆年間，石姓中就有人遷到景谷牛肩山定居，與保黑通婚。嘉慶元年（1796）因清政府驅逐保黑的戰爭，石家先祖隨同過江逃亡，來到「五佛五經」屬之下的王佛爺轄下大山一帶。「我們姓石，我們的祖先都是漢族，這一帶各村還有姓舒、周、李、董的，不過我們現在都是拉祜族了。」⁶⁰ 石家的渡江始祖後來娶了當地大戶吳姓的女兒為妻，生子石麟。石麟之子其後與他的侄子石成義都參與了鎮壓瀾滄江東景谷、思茅與回民白旗軍的戰事，在岑毓英奏請招降之前，就曾經獲得過清朝的土職鈐記。

進入保黑山後的許多江西、湖南移民，有的成為地方首領，有的與土著通婚，逐漸改變了自己的身份，成為保黑或者佤族。保黑山接受招降的原來

⁵⁸ 見章炳麟，〈西南屬夷小記〉、〈太炎先生手札五十五通〉等文稿，載李根源輯、楊文虎等校注，《永昌府文徵（三）》（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2667-2693。

⁵⁹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頁730。

⁶⁰ 馬健雄，田野筆記，大山大寨，2005年5月18日；石炳富編，《雲南瀾滄石氏宗親譜》（雲南瀾滄：大山鄉大山大寨）。

「五佛五經」頭目，大多是隨保黑一起流徙的移民。所不同者，還有許多像他們一樣的漢人移民，比如張輔國及其後代張登發、張朝文等，則選擇了與清政府對抗的道路，以「佛祖帕」的名義繼續反抗，因而他們也更加「保黑化」，被村民看作重生的厄沙佛祖。後來，李芝龍的兒孫也重新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成為保黑的首領。因此，在「五佛五經」屬下各部首領中，許多是漢人移民成為保黑首領的，例如活躍在瀾滄江渡口一帶的大山石朝龍、石朝鳳兄弟，和下改心南部雅口一帶的李芝龍。於是，岑毓英採取間離手段，招安各派保黑首領中比較容易爭取者授予世襲土職。緬寧鄉紳邱德鳳於是奉命過江招降石家。^① 石家兄弟石朝鳳、石朝龍與他們的侄子石廷子積極響應，與清軍配合，保黑山各派苴摩於是分裂，「五佛五經」驟然離心。岑毓英剿撫並用，李芝龍獲授土都司，石朝龍和石朝鳳之孫石光玉獲土守備，李齊芳、李春先獲土千總，張文科、石廷子為土把總，李大昌、蕭修武為土外委，這就是新設九土司。^② 由於石家和各接受招撫的土司多據於保黑山邊緣，早已控制了交通要道，在接受招安之後，各派系土司們都參與鎮壓保黑、保護鎮邊廳官員的軍事行動。接受招撫的第二年，各家新設土司紛紛帶土兵效力，進攻其他各地的保黑，而其中又以石家最為得力。

石家土司可分為兩系：石麟傳子蠻海土守備石朝龍、大山土守備石朝鳳。石朝龍的子孫皆因率兵攻打「五佛五經」之「允帕佛」，再次因軍功獲受土都司銜；石朝鳳則負責進攻「東主佛」獲軍功，其子石玉福在1918年因保黑圍攻圈鎮邊廳城，帶兵解縣長之圍，隨後被委任為圈糯區長。石成義一系，子石朝經傳石廷子，石廷子傳石玉清，至石炳鈞1952年出走緬甸。^③ 儘管「五佛五經」已經瓦解，許多保黑首領仍然繼續頑強堅持抵抗西進的清軍，逐步退向西盟，與佉山部落和擺夷土司聯合。光緒十七年至十八年（1891-1892）間，清軍才最終招降了退入佉山的「三佛主」。^④ 光緒十七年（1891），鎮邊廳同知王績威巡察早已封閉的募乃銀廠，籌備重開銀礦。不料，為數不多的官軍被數千保黑軍圍困，鎮邊營參將尉遲東曉前往營救，結果中毒箭身亡。石廷子、李芝龍等人趕來，經過苦戰將王績威救出，搶出尉

① 邱廷和，《悟莊文存》（雲南臨滄：臨滄市圖書館藏，1994年重印本）。

② 周鍾岳等編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七）》，頁730。

③ 馬健雄，田野筆記，2005年5月18日。

④ 光緒《續雲南通志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4，〈上諭〉。

遲東曉的屍體，^⑥官方因石廷子的戰功，將募乃老銀廠地區一併交付石廷子管理，成為「世襲賢官兼募乃土把總」，除原有大山鄉一帶各村寨之外，還領有鎮邊廳中部的86個村寨、三千戶居民。^⑥從此，石廷子從瀾滄江邊遷往募乃，逐漸將這裡變成出入佤山的門戶。石家初期的經營獲得了王佛爺佛的支持，同時也參與江東岸的政治衝突，所以石家早已經營着來往瀾滄江兩岸、溝通各地的政經網絡，與其他各家地方首領控制了瀾滄江渡口和佤山交通綫。^⑦民國成立後，鎮邊廳改為瀾滄縣。各家土司又在瀾滄江邊建立鹽倉，向縣政府承包了在渡口收取捐稅的權利，控制了兩岸的貿易。從石家土司屢屢救援清軍的戰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是不能不依賴石家的地方武裝的，這也是邊界問題出現之前，清政府不願貿然進佔保黑山的原因。民國建立之後，這樣的局面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石廷子之子石玉清（1886-1937）承襲閑官兼募乃土把總職銜，募乃一帶的社會秩序逐漸安定下來，商路恢復，募乃礦區再度繁榮。由於募乃是銀鉛伴生礦，各地商人、礦工返回募乃開辦鉛廠，將過去數百年間煉銀廢棄堆積的鉛礦渣熔煉為鉛錠，運往緬甸售與英國商人，每年出口量在50至150萬斤之間。^⑧募乃土司的影響也隨之擴大到民國時期的瀾滄縣各地。1936年，參與邊界勘察的歷史學家方國瑜到訪時，石玉清「年已五十，忠厚長者也。自言原籍江西，來居滇已九代」。方國瑜引述當地人的說法，「石玉清原係黃保黑，後歸漢，在大山蠻海一帶權威甚大，人民皆乎為石大人」，但是，「惟余詢土民，多言玉清為漢人」。在田野調查中，一位曾追隨石家的拉祜老人談到，石玉清之子石炳麟總是講拉祜話，並對他們說，「我們是拉祜，要抵抗那些從別處來的漢人」。^⑨在過去數十年間，石家在解釋自己的族群身份時，總是策略性的、因對象而異。一方面將自己看作是「五佛五經」被摧毀之後保黑（拉祜）的頭人，另一方面他們又記得自己的祖籍為江西的「漢人身份」。在這裡，石家土司無論在自己的社群中，還是在接待各類訪客時，都具有兩重性和模糊性，以方便地運用他們介乎「漢」與「夷」之間的優勢與資源。這一身份和地域的優勢，使得石家在文化上能夠溝通漢、保黑與佤

^⑥ 傅曉樓，《瀾滄略史》（1943），雲南瀾滄縣檔案館藏手稿，54-1-230；石炳銘，《雲起雲落：血泪交織的邊境傳奇》（臺北：時報文化，2010）。

^⑥ 石炳銘，《雲起雲落：血泪交織的邊境傳奇》，頁68。

^⑦ 此地為瀾滄江邊由大山通往猛班的渡口，非今竹塘鄉的募乃老廠所在地。

^⑧ 方國瑜，《滇西邊區考察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104。

^⑨ 馬健雄，田野筆記，2005年6月20日。

山各部落，並與整個保黑山地區控制各地的豪強大戶，結成了一個緊密的通婚網絡。

石玉清娶九土司之一的蕭修武女兒為妻。蕭修武的父親原是從江西吉安來「走銀廠」的礦工。蕭修武娶保黑女子為妻，成為往來緬甸、佤山和江東景谷縣的商人，擁有自己的武裝和馬幫。他從緬甸販來洋貨，也從景谷運鹽到佤山出售，精通保黑和擺夷語，與勐角、勐董土司是至交，過佤山到緬甸臘戍、曼德勒通行無阻；於是，他的外號「蕭百萬」在保黑山家喻戶曉。^①蕭修武次女蕭二娣嫁給石玉清，也將蕭家的商業經驗帶到石家來。民國以來，滇軍政府實施「禁烟」政策，即當鴉片貿易需要部份地禁止的時候，留下來的鴉片產區也比較容易控制。石家也因鴉片貿易而收入劇增，這主要得益於蕭二娣的經營和募乃石家與西盟、雪林等一直盛行獵頭的佤山部落之間的友好關係。因為獵頭，漢商無法進入佤山，雲南督軍唐繼堯曾派一營官兵攻打佤山部落，結果全軍覆沒。^②佤山、保黑山一代出產的鴉片不但量大，尤其是募乃出產的鴉片，在著名的「雲土」鴉片中質量最好，全省大的烟商多少都和石家有生意往來。繼唐繼堯之後，龍雲主政雲南，石家的財富與日倍增。蕭修武之子蕭臣榮在昆明讀書時，與龍雲四子龍繩文拜為結義兄弟。這樣，蕭家、石家與龍家聯為一綫，最昂貴的鴉片也是先由石家送到玉溪，由龍家派人用私車運到昆明，繞過憲兵盤查。^③民國以來，石玉清一家逐漸控制瀾滄縣主要的鴉片市場。每年冬春鴉片收成季節，各地大小商販雲集募乃，有的人趕着大群的水牛、黃牛來與種烟的佤族和保黑交易。春天播種前，佤山部落各村寨需要剽牛祭祀，部落頭人也以剽牛的多少確立其權威。^④在石玉清次子石炳麟的努力下，鴉片貿易集中到完全由石家控制的、特定時間內的專門市場來進行，即在南本、木嘎、募乃等地開設「烟會街」。「開『烟會』」是石家首創的。國民政府禁烟，要將政府治所變成無烟之地。但是石家在『烟會』中的角色，主要目的是維持秩序，搭一些遮蓋的棚子、蓋茅草房供應給商人做生意。後來由胡有祥（蕭二娣侄子）負責，又

① 石炳銘先生訪談，2009年7月9日；胡超記述，李先潤整理，〈安富里目——蕭百萬〉，載瀾滄縣政協編，《瀾滄文史資料》，第三輯（雲南瀾滄：瀾滄縣政協，2005），頁259-268。

② 石炳銘先生訪談，2008年12月19日。

③ 石炳銘先生訪談，2008年12月19日。

④ 編輯組，《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雲南民族情況彙集》，下冊（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頁193-195。

去木嘎開了一個烟會街，但最熱鬧的是南本烟會，主要是佤族來交易。政府禁烟禁得越多，烟價就越高。『烟會』上，滿山遍野都是水牛。民國二十八年（1939）前後，瀾滄一帶輸出的鴉片烟達到二十五萬餘兩，合一百二、三十萬元半開（半開的意思，是兩枚合為一元，一枚為半元面值）。^⑭ 出於對石炳麟個人魅力的敬佩，西盟佤山酋長岩頂將自己剛出生的兒子拜石炳麟為義父，石家成了中課班箐部落最好的朋友。^⑮ 瀾滄石家與佤山的特殊關係，使得佤山中、南部各部落也不得不依賴於石家所控制的市場來輸出鴉片，購進糧食和生活用品、輸入牛隻以剷牛和獵頭維持村落中的凝聚力與部落間的緊張關係，佤山因之能夠以「生佤獵頭、熟佤保商」的名義，維持着社群邊界和地域控制。^⑯

石家因此成為在佤山劃界的重要依賴對象。石玉清繼續以兒女親家擴展石家的影響力，長子石炳麟娶了舒炳忠之女，舒炳忠追隨佤黑「三佛主」進西盟山，與三佛主的女婿李通明共同管理西盟山；長女嫁給控制與車里交通的酒房土目楊德明為妻，次女嫁給湖南移民後代的縣參議長黃道能之子為妻。不過，如果與緬寧紳首們比較，民國時期的瀾滄大戶最重要的資源，卻是與佤山部落、與佤黑（拉祜）人的密切關係，共同成為生意上或者政治的合作夥伴。由於這些大戶控制了鴉片市場，他們的網絡也直接深入到滇軍上層。總之，溝通上下、交通佤山，得益於聯為一體的石家和蕭、楊、黃、李等各豪強大戶共同的優勢，得益於他們跨越族群界限、半漢半夷、能漢能夷的文化身份及其極具穿透力的邊緣特性。因此，石玉清才成為中英劃界的重要活動者。

1935至1936年，中英再次會勘邊界，石玉清應邀擔任中方顧問。此時，佤山各部落首領稱為「十二召華」，其中大部份都希望在勘界後劃歸中國。中、英兩國加緊在佤山活動，希望在測量和確認「分水嶺綫」時以己方為重。石玉清派親信、石家師爺張石庵以瀾滄縣長名義，向各佤山部落頭人發放了委任狀和銀牌，動員頭人組織「召華自治政府」。不過各部落間積怨甚深，佤山政府無法組織起來，但是這些活動將瀾滄一方的影響在佤山做了極大動員。石家召集西盟佤山頭人到會議地點勳梭向英方示威，表達要求劃歸中國的願望。石玉清、張石庵等人又以瀾滄縣名義組織「通訊社」，向全國

⑭ 石炳銘先生訪談，2008年12月19日。

⑮ 石炳銘，《雲起雲落：血泪交織的邊境傳奇》，頁100-102。

⑯ 有關「生佤獵頭、熟佤保商」的地方政治，參見道光《普洱府志》。

報館發通訊，以防最後將西盟劃歸英屬緬甸。當雙方勘界委員於1936年春節期間匯集勐梭時，石玉清組織「新春同樂會」，調集佤黑和佤族村民，在頭人帶領下扛着中國國旗，到雙方開會地點跳葫蘆笙，對天鳴槍放炮，歌舞通宵達旦兩晝夜。勘界中立委員只好對英方表示，這裡屬於緬甸實在沒有理由。最後雙方代表閉門會議，確定了國境綫走向，即後來宣佈的1941年綫。^⑦

石家最初是清政府深入佤黑山的依賴力量，民國以來又成為一面溝通佤山部落、一面深入滇系軍閥上層的地方勢力。以其代表地方聯接滇軍上層的能力而言，石家與彭家是一致的。可是，車里的柯樹勳卻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被「滇人政權」疏遠和排斥。這一變化亦說明，在向民國轉變的過程中，地方化的滇軍體制排斥了與過去的清朝關係密切卻不能夠在地化而成為「滇人」的其他漢人勢力，國家的邊疆和地方政權的主體，都經歷了重新確立的過程。

六、柯樹勳的「廣人」武裝集團與車里土司

中英滇緬、中法滇越邊界的劃定，都必然交接於佤黑山以南的車里。在進攻佤黑山的同時派出另外一支軍隊控制車里，才能兼顧英、法的威脅，將滇、緬、越（老撾）的分界三角，從模糊的車里土司與勐良（景棟）、老撾各擺夷（撣傣）土司之間劃分出來。柯樹勳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跟隨中法勘界委員、岑毓英的親信黎肇元來到車里的。^⑧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法滇越劃界剛結束，英國就派兵到景洪向宣慰刀承恩宣稱，因為車里宣慰承襲是由緬王批准的，現在緬甸屬於英國，「十二版納」也應歸屬英國，被刀承恩拒絕。此時，佤黑山首領張朝文、扎法、罕炳昭等人正在與清軍作戰，迤南道陳燦派兵進駐車里，以圖監督車里宣慰與法國、英國的往來，防止各勐土司與佤黑山首領聯合，防備英國與法國乘機侵入，保證訊息暢通，以便在劃分邊界的敏感時期作出迅速反應。^⑨光緒二十五年（1899），陳燦與英方官員勘定了「十二版納」的滇緬邊界，從北部孟連土司所屬南卡江起，南過

⑦ 張石庵，《所謂「中緬未定界」概況》（1952），雲南瀾滄縣檔案館藏，154-3-064-089。

⑧ 羅養儒，《雲南掌故》（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頁473。

⑨ 李拂一引自陳燦，〈宦滇存稿〉，載《十二版納紀年》，頁194。

打洛，沿南覽河、南雅河至瀾滄江，即後來所稱的「滇緬南段已定界」。這樣，瀾滄江成為車里與英屬緬甸、法屬越南的界河。⁸⁰

柯樹勳（1862-1926）先在廣西投效岑毓英親信何元鳳部下，隨部入越南，因作戰勇敢，升任滇越鐵路工地巡防管帶。滇越鐵路工程由法方負責，中方參與，柯樹勳於是有機會與法國工程人員一起工作，學習測繪和建築工程中的許多管理和技術，成為滇越鐵路河口邊鎮集軍權、政權於一身的要人。宣統二年（1910），當勘界委員黎肇元請求總督李經羲增援鎮壓車里境內勐海、勐遮因土司爭襲事件引發的地方動亂時，李經羲決定派柯樹勳帶領能「烟瘴」的兩廣兵到車里。八月，柯樹勳帶領粵勇到達勐海，當地民諺說，「包穀戴紅帽，廣馬就來到」。正當玉米成熟時節兩廣兵進入了西雙版納，在當地人看來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⁸¹

同治時期，勐海曾因召勐承襲與車里宣慰司發生過衝突，在普洱鎮總兵的界入調停下平息下來。光緒年間，版納六順（今普洱市翠雲區）土千總刀繼善與勐遮召勐刀正經合謀，支持在勐海與車里宣慰對立的一派，反對車里宣慰刀承恩，以圖取代車里宣慰，驅逐聚集勐海的漢人茶商。官軍前往援救車里宣慰，雙方於是在頂真（今景真）會戰，事稱「遮頂之亂」。保黑山的首領李張國也率領保黑隊伍趕來，加入刀正經一方與官軍對壘，意在驅逐漢商、佔領景洪。雙方對峙五個多月後，官軍會集的土練和漢兵已經超過了一萬人，隨着天氣逐漸炎熱，漢人官兵開始患瘧疾大量死亡。柯樹勳帶領1,300名兩廣兵前來增援，不足一個月就為黎肇元解了圍，以新式武器和靈活戰術贏得了戰鬥。「柯樹勳平息了這場叛亂後，就沒有再回內地了，把部隊撤到景洪駐扎下來。柯樹勳還在景德建立了衙門，把西雙版納劃為八個區，每個區派一個漢族區長。自從柯樹勳到西雙版納後，百姓的負擔加重了，百姓的戶頭稅變成了兩份：一分交漢官，一分交傣官。」⁸² 歷史上車里宣慰（即「召片領」）及下屬各土司（即「召勐」）的爭襲，往往有周邊各派擺夷勢力的較量和雲南官方的干預。車里也習慣以兩套系統來應付清政府和緬甸國王一方，既希望雙方都不得罪，也要同時面對雙方的壓力。「遮頂事件」發生後，柯樹勳的干預一方面有界入邊疆事務新形勢的需要，另一方

⁸⁰ 陳燦，〈宦滇存稿〉，載方國瑜編，《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709。

⁸¹ 侯祖榮，《西雙版納現代歷史人物》（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頁3、14。

⁸² 鐵峰、岩溫扁主編，岩溫膽等翻譯，《西雙版納秘史》（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勐海牛馱墊之戰〉，頁370。

面也是因為車里「十二版納」內部各土司的衝突和來自緬甸，特別是勐良和木邦的其他土司參與相關聯，需要將聯為一體的土司們分開。

1911年，隨着越來越多的漢人和官軍進入車里，以及不斷推行的新政策，擺夷村民的不安情緒逐漸在車里各地蔓延。大家傳說，勐勇某村有一隻黑母雞忽然會講人話，唱了三天歌。主人岩那夫婦將黑母雞的歌用傣文寫下來，在各勐流傳，鼓動打擊、抵禦漢人，以免重蹈頂遮失敗覆轍。各地村民都將頂遮事件看作是抵抗漢人和漢官支持的宣慰刀承恩的戰爭。同時，柯樹勳計劃推行「改土設流」，地方頭人也以民間的反漢情緒為警號，希望駐軍不要輕易設流。⁸³ 第二年，柯樹勳還是在景洪設立了「普思沿邊行政總局」，自任局長，清查戶口，按戶徵收銀元二元，並設立了勞役稅、特產稅等新稅種，委派他帶來的手下為新設各區的區長。在對待漢商不斷入侵的問題上，車里各召勐與倮黑山頭目的態度相類似。清軍過江之前，車里北部的倮黑山已經是重要的鴉片產區，鎮邊廳建立之後，漢商過江貿易受到保護，⁸⁴ 倮黑烟農失去了「五佛五經」時期的政治經濟保障。民國以來，「瀾滄山多田少，糧產不足，四山倮黑，大都依賴栽種鴉片為生。雅口一區，⁸⁵ 漢人前往經營鴉片生意者眾，蔚成大市。當地漢人，平昔於倮黑不無盤剝為利者，倮黑拙於心計，因此一年辛苦所獲，既不足以果腹，更難求蔽體。見漢商之居住其地者，勿須辛苦耕作，而衣食豐贍，逐年對秋烟之交納，復多苛刻，種烟之倮黑，幾無不欠下子孫債者」。⁸⁶ 所以，「殺官廢債」成為倮黑起事的原因，與漢商通過在糧荒季節放高利貸以收穫「秋烟」抵償本利的盤剝方式有關，也與倮黑山在商品經濟侵入之後，普通村民因「五佛五經」的崩潰而缺乏政治保護有關。在大山、募乃及黑河沿岸山區的倮黑山中部一帶，石家尚可以以自身介乎漢、夷的中間性，以烟市和限制高利貸的形式維持村民與市場的關係；但是在倮黑山與車里鄰近的地區，原來李芝龍控制的雅口一帶，漢商的侵入加之官軍的打擊，逐漸消解了李家的權威並引起反彈，李芝龍的孫子李龍、李虎兄弟又成為領導倮黑驅逐漢商的首領。新一輪的衝突緣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協議，決定在十年內禁絕邊境地區的罌粟種植，除佹山之外，地方官吏紛紛派人到處鏟除烟苗，

⁸³ 李拂一引自〈普思延邊行政總局檔案〉，載《十二版納紀年》，頁225。

⁸⁴ 光緒《續雲南通志稿》，卷73。

⁸⁵ 今瀾滄南部糯扎渡鄉，靠近車里。

⁸⁶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233。

以應付檢查。一位從四川到雅口謀生的把戲（魔術）藝人丁三吉，人稱「丁把戲」，因不平於漢商對傣黑的盤剝，自稱「仙人」，作為軍師與李龍、李虎合作，沿用過去宗教動員的方法，組織發動傣黑驅逐漢人。他們與車里各召勳密謀串聯起事，相互支援。⁸⁷「至民國七年（1918）春二月，仙頂營附近傣黑首先倡亂，一舉而將雅口燒搶一空，殺死漢人不少，自此以『滅漢』為號召，各地傣黑蜂起響應。在雅口掃蕩三日後，蠻蚌、蠻宋⁸⁸等處傣黑，起而逐殺漢人，並殺死蠻蚌土司，將蠻蚌燒搶一空。」⁸⁹與大山土司石玉福配合，柯樹勳帶領兵北上救援，與普洱方面援軍合兵，沿途柯軍殺死傣黑一千多人，最後將丁把戲俘虜。進攻傣黑山時，柯樹勳命令車里宣慰的繼承人、刀承恩長子刀棟樑隨同帶土司兵參與對傣黑作戰，本來策劃驅逐漢人的擺夷頭人和召勳們，只好因柯樹勳挾持了刀棟樑而放棄計劃。⁹⁰大量傣黑民眾戰敗後被迫遷往糯福，南下緬甸。

在南段未定界山區的禁烟運動，也因傣黑的抵抗而失敗。1920年，雲南一方以緬甸麻栗壩（今果敢）、木邦等地的鴉片出產量龐大並大量販往中國內地，英緬方的戒烟也沒有收到任何效果，於是開放烟禁，以獲取支持滇軍作戰的財源，每畝罌粟科罰金二元，⁹¹車里共認種六千多畝罌粟，上繳雲南省庫罰金一萬九千三百多銀元，沿續六年。⁹²第二年，車里再開徵茶稅和百貨厘金，隨後車里八區改為八縣，柯樹勳於是將地方經濟發展中的新增收益控制起來。1924年，柯樹勳帶領新任車里宣慰刀棟樑和各勳的召勳、頭目組成「觀見團」，前往昆明參觀並受到唐繼堯接見，「藉使邊人瞻仰民國規模，漢官威儀，部隊軍容，文教建設，俾親身體認內地之廣大，民物之眾庶，以開拓其眼界，擴展其心胸，怯其錮蔽自大之念，泯其自外攜貳之心」。⁹³後人有言，這是雲南歷史上的第一次少數民族觀禮團。「因柯樹勳所帶士兵皆是兩廣人，夷民故而常詢問兩廣地方可有車里之大的疑問。」⁹⁴1926年，柯樹勳病故，職務由其子柯祥暉繼任。柯樹勳死後，兩廣兵群龍無

⁸⁷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233-234。

⁸⁸ 即鎮邊廳城圈糯，今瀾滄縣謙六鄉一帶。

⁸⁹ 傅曉樓，《瀾滄略史》（1943）。

⁹⁰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236。

⁹¹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237。

⁹²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238。

⁹³ 李拂一，〈車里土司昆明觀光記〉，載氏著，《十二版納紀年》，頁244。

⁹⁴ 侯祖榮，《西雙版納現代歷史人物》，「柯樹勳傳」，頁55。

首，車里政權逐漸被唐繼堯的親信徐為光控制，柯家的兩廣兵與徐軍相互爭奪，1928至1929年雙方發生兩次大規模衝突，在柯家一方稱為「倒徐運動」，在雲南軍閥一方稱為「廣人之亂」。^⑤最後，柯樹勳之子柯祥暉出走緬甸，徐為光被龍雲調往昆明，至1930年代西雙版納地區才逐漸平靜下來。

柯樹勳的廣人部屬與雲南軍閥的衝突，也是清朝向民國轉變時，岑毓英班底與雲南地方勢力之間的較量。「遮頂事件」後，柯樹勳前往緬甸勐艮考察英國人的治理方法，之後向雲南省政府提交了「治邊十二條陳」改革計劃，希望借鑒英國人的殖民經驗治理車里，他自己總結為「土流兼治」，將賦稅合併為門戶捐，設漢官保護「十二版納」，司法（緝捕）由漢官掌握，邊界事務及與英屬緬甸、法屬越南的交涉也歸漢官負責，土司無權參與。^⑥他所推行的政策，與彭銀新設雙江縣並沒有特別的不同之處。不過，實施的過程中，柯樹勳自己更強調要「以漢化夷」，在景洪新建武帝廟，又為曾在遮頂事件中參與驅逐漢商和車里宣慰的勐遮召勐刀正經之子，取漢名為刀忠良，為勐海召勐取漢名為刀柱國，其長子取名刀忠漢，對他們參與反抗的事不再追究，運用「誘入文化以收拾邊地人心」的「攻心」策略。^⑦新設八個漢官管理的區，有七個區長是柯家親信。但是，「樹勳所率廣籍官兵，多恃賭為生，夷民因賭而頃其家者，不可勝數」。^⑧柯樹勳死後，徐為光、孫天霖等唐繼堯親信企圖解除廣人武裝，希望他們能夠開田種地，消除廣人與土著之間的矛盾。但是，當徐為光和手下企圖收繳柯樹勳廣人舊部的槍支時，立即遭到廣人圍攻，於是徐下令「凡遇廣人，格殺勿論」。^⑨兩邊衝突升級，逐漸演變成車里的兩廣人與雲南人之間的仇殺，一些雲南茶商也被廣人殺害。^⑩最後柯祥暉帶領兩廣人士兵出走緬甸，車里漢官的政權落入滇軍手中。

柯樹勳依賴政治謀略和軍事鎮壓，控制了車里聯合保黑山的抵抗運動，但在日益蓬勃的鴉片和茶葉貿易方面，兩廣人未能深入參與，反而因不能夠

^⑤ 侯祖榮，《西雙版納現代歷史人物》，「柯樹勳傳」，頁81。

^⑥ 柯樹勳，《普思沿邊志略》，卷122，頁97；李文林，《到普思沿邊去》（載《西南文獻叢書》），卷125，頁72。

^⑦ 侯祖榮，《西雙版納現代歷史人物》，「柯樹勳傳」，頁25；柯樹勳，〈普思沿邊志略自叙〉，載《普思沿邊志略》，卷122，頁17。

^⑧ 李拂一引自〈車里筆記〉，載《十二版納紀年》，頁254。

^⑨ 李拂一引自王為乾，〈破衲筆記〉，載《十二版納紀年》，頁261。

^⑩ 李拂一引自〈車里筆記〉，載《十二版納紀年》，頁264。

融入地方社會，成為民國建立後「滇人」興起的過程中的他者「廣人」。民國在雲南的建立，意味着滇人軍閥的興起，無論是車里的土著還是當地的漢商，都將柯樹勳集團視為清朝的外來者，「廣人」最終不得不將權力交給「滇人」和土司。顯然，武力和文化「攻心」並不足以建立起地方統治集團穩定的政治經濟體系，僅僅依賴少數「廣人」武裝，身後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不能夠與本地土著之間建立相互依賴的關係，參與不了對新經濟的控制，柯樹勳集團沒有能夠像彭錕和石家那樣順利整合到更新了的邊疆社會之中。在界外英法殖民主義的威脅之下，邊疆及邊疆上的國家體制從清朝走向民國期間，能夠順利將過去相對於「蠻夷」的「漢人」政經地位與新興的「滇人」政權對接的利益集團，才能夠繼續保持其政治文化上的統治地位，延續其民國時期地方軍閥體制下的國家代理人的身份。此時的國家，已是「滇人治滇」的政治體制，不能夠順利轉化為「滇人」的勢力如柯樹勳集團便逐漸被排斥，然而，所有隨政治經濟轉變到來的打擊，最後都要由保黑和擺夷民眾承擔起來。

七、總結

在南段滇緬邊疆社會從清朝向民國的轉變中，我們看到外省移民的在地化是多樣性的。其一，漢人移民在緬寧等改流地區建立起文化與政治正統的地位，將他們的外來者身份在地化的同時也正統化了。在杜文秀起義被鎮壓之後，緬寧士紳建立起強大的團練武裝，從而在勐勐和保黑山北部建立起他們的政治統治，並實施對新興經濟資源和市場的控制；其二，當清政府以瀾滄江為防堵界限時，移入保黑山區的移民卻經歷了保黑（拉祜）化的過程。其中一些人成為宗教運動的領袖，推動了保黑政治體制與族群身份的興起。然而，在英法殖民主義的到來和中緬貿易擴展以後，在邊疆社會成長的新興地方豪強聯姻集團，又充當了「漢」、「夷」中間人的角色，控制了貿易鴉片渠道，與雲南軍政上層相溝通；第三，清朝岑毓英派系中的「廣人」集團，雖然在推動西雙版納轉變為邊界清晰的中國邊疆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柯樹勳依賴政治軍事謀略，試圖以文化教化來達成對邊疆的控制的策略，在缺乏在地化可能的情况下，未能深入參與地方經濟生活的轉變，在民國雲南地方勢力興起的背景下逐漸邊緣化。在國家體制轉變之際，邊疆社會不但成為「滇人」政治精英借邊事展開民族主義動員的一個策源地，也成為民國初年雲南滇系軍閥經營的政經體制的重要根據地，邊疆社會因而成為政

治生活的一個中心。

據此，我們還需要檢討國家體制的滲透對「壩子」與「山區」間族群政治的影響。南段滇緬邊疆的案例，遠遠超出了利奇(Edmund R. Leach)模式所討論的「克欽」與「撣傣」之間政治體制與身份的互動更替。因為，利奇既排斥了在中華帝國邊緣上「漢人」與「漢官威儀」的文化與政治意義，也忽略了歷史動態下國家和遷入移民作為第三方存在。^⑩ 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漢人」身份之確立，既是推動少數民族身份動員、文化重構的重要動因，也是少數民族以漢人為「他者」進行自我建構的外在條件。在人口、經濟、文化等條件與國家政治的共同推動下，「漢人身份」的確立才能夠與漢人士紳政權相對應。在族群政治的長期拉鋸中，「夷」變「漢」或「漢」變「夷」一直存在着。邊疆化過程中，漢人與非漢人社會的確立既表現為同構或協作，也關乎國家的態度、國家的體制，以及地方對國家所褒揚的文化正統進行操控的可能性。其背後還隱含着不同的族群與政治體制之間在統治權、經濟利益和文化意義等領域間的競爭與改變的路徑。如果再對比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逃亡者的山區」模式，即那些居住在山區的群體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和主導能力因而能夠逃離國家的統治，那麼至少在本文所檢討的邊疆社會，這一狀況並非實在。^⑪ 在國家深入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期間有許多抵抗和遷移，既有山區之間的流動，也有壩區之間的流動；山區有「圈」，壩區也有土司和官府。但是，沒有稅的自由主義烏托邦還沒有發現過，儘管「稅」的文化意義可能非常不同。滇緬邊疆在清末民初的轉變呈現出，不同群體所建立和延續的政治建構及互動，其中充斥着各種複雜多樣的可能性，並使得國家不能夠漸次深入，因而在1880年代國境綫偏偏就停在這裡。「邊防三老」的出現，也就是將國家之界綫在此停留的最好詮釋。

隨着國家體制的轉變，留日學生基於邊疆局勢，發展、延伸了「抵抗英法以保雲南不亡」的救亡民族主義論述，這也是雲南地方精英將邊疆政治與國家興亡結合起來，意欲擺脫自己的「蠻夷」嫌疑的代表性論述。具體而言，西南軍閥興起的過程，同時也是民國在西南確立的過程。滇系軍閥宣揚的「聯省自治」論述，不能不追溯到「滇人治滇」的起始，而在邊疆上被「滇人」排斥的「廣人」，正好為這一過程提供了詮釋。彭錕與柯樹勳都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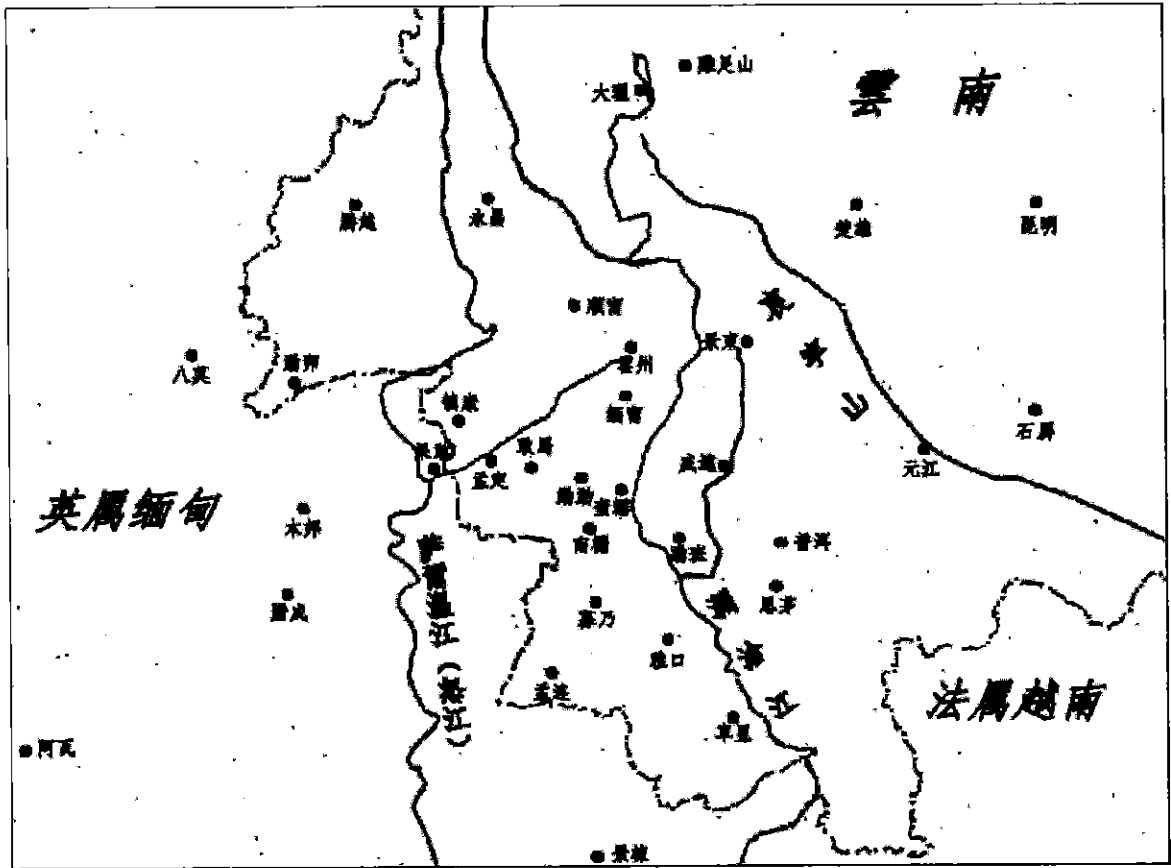
^⑩ Edmund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⑪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以「漢文化正統」為其身份標籤，都參與了對國家邊界的設置，但是在地方脈絡中，文化與身份的合併還是依賴於長期的政治互動和相互間的經濟依賴，當然，其最大獲益者還是士紳與商人。軍事上的征伐並不足以重整地方秩序，漢人移民也並非必然成為族群類別中的「漢人」，可是「非漢非夷」的身份類別卻在國家轉變之際，成為壩區政治體制延伸到山區的重要橋樑。或者說，「江右人」和「兩廣人」能否在清末民初的雲南政局中佔據一席之地，關鍵還是他們有沒有參與壩區與山區的身份和政治的共建和轉換，有沒有耕田、染布、趕馬幫，成為在地方生活又有日常利益爭奪的群體。接下來，「拒英法於界外而救雲南不亡」才成為此時興起的各類民族主義思潮中，一種基於邊疆族群政治現實的論述。具體而言，地方利益集團與身份政治既捲入國家的改變，也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國家在邊疆上的建構。「國家」作為抽象的概念和制度，在地方上是一些利益集團對「國家」及有關國家的理論的操控，用國家的語言來經營地方政治經濟體系，其中族群身份成為一種競爭的工具。

（責任編輯：周驚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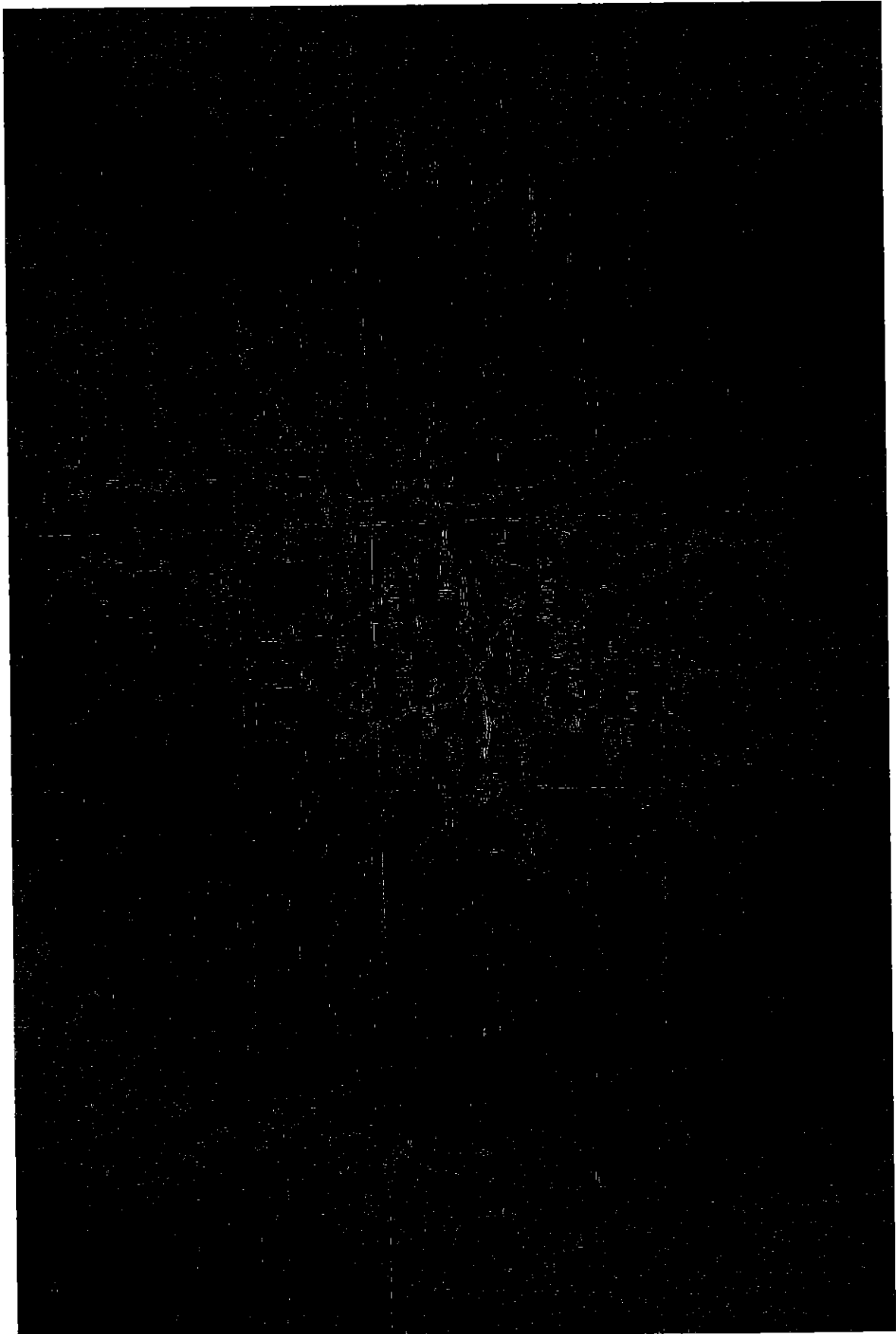
附圖1：南部滇緬邊疆示意圖



附圖2：瀾滄江—怒江區域地形圖



附圖3：清末民初的滇緬邊疆



圖片來源：《中國分省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12。

“The Three Elders of Frontier Defense”:
State Ag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Jianxiong MA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Peng Kun, Shi Yuqing, and Ke Shuxun were awarded the title of “Three Elders of Frontier Defense” by the Yun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were well known by native people for their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40s. The Peng family established Shuangjiang County out of the earlier “Five Buddha districts” system,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the indigenous Lahu (Luohei) people. The Shi family weaved a marriage network with other powerful families and acted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control local opium markets and trade with tribes in the Wa Mountains. The Ke family implemented a political reform known as “dual governance by chieftains and officials” in Sipsongpanna, south of the Lahu and the Wa Mountains. These three powerful men and their familie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states over several decades, and secured their ow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oral interests during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s amo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powers over the drawing of a border between China, Burma, Vietnam and Laos.

Frontier politics, which was among the central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deeply affected by native agency. Native involvement allowed political reforms to the system of native chieftains to continu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hinese stat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nation-state through the demarcation of borders. Through their influence, new economic patterns of opium and tea trade took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reshaped local society; the presence of new immigrants led to identity change as they became ethnically non-Han and in some cases middlemen between Han elites and other local ethnic groups. As frontier politic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teracted, the Qing system gave way to the warlord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Local agents of the state participated not on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but also in the project of border demarca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ethnic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l ecology in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Keywords: nationalism, Yunnan Warlords, Lahu, Wa, Sipsongpanna